

方寸之间天地宽

——记印谱收藏家林章松先生

沈津 董天舒

林章松先生能集印谱收藏之大成，一是独到的眼光，二是对印谱的执念，三是雄厚的财力做支撑，当然也少不了平日里的节衣缩食、宽打窄用。然而追根究底，成就林先生今日收藏印谱之规模的，是他兀兀穷年、矻矻终日的勤谨和笃学。

博便不能专精，希望他能够在这些爱好里找到自己最为热爱的一项仔细钻研。这位学生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决定要专攻篆刻。这一学，就是50余年。

1978年的某天，香港某渔业老板觉得给他做商标设计的年轻人是个可塑之才，便跟他打赌：三个月的期限，年轻人给老板推销海产。若年轻人入了此行，他就给老板打工；反之，老板付给年轻人一年的薪水。年轻人对这个赌约信心十足，他太清楚自己对渔业的一

无所知；老板则对年轻人的做事能力慧眼识珠，知道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三个月过去，年轻人竟然如老板所料，生意做成了一单又一单，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诧，原来自己竟有这方面的天赋。于是，年轻人跟着老板做起了海产生意。这一卖，又是40余年。

这个习篆的学生，如今收集的印谱之多、之稀有，远远超过国内的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在国内的印谱收藏界首屈一指；这个卖鱼的青年后

来创设了自己的渔业公司，规模庞大。其实，卖鱼的青年和习篆的学生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林章松先生。教他国文的老师就是对林先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曾荣光先生。林先生将海产和收藏印谱这两件事结合在了一起，以海产供养收藏，以生计满足爱好。每逢国内各种重要的古籍拍卖会，林先生总是要花大把的时间查核拍卖图录中的印谱，特别看重的是自己所未藏的印谱或别人不入眼的残谱、剪贴谱。林先生能集

印谱收藏之大成，一是独到的眼光，二是对印谱的执念，三是雄厚的财力做支撑，当然也少不了平日里的节衣缩食、宽打窄用。然而追根究底，成就林先生今日收藏印谱之规模的，是他兀兀穷年、矻矻终日的勤谨和笃学。也许，从商人的角度看，他是在经商之暇收集印谱，但从收藏的角度来说，他的重心却在于研究印谱，从商倒成了他搜集印谱的

(下转4版) ➔

◀ (上接2版)

涯中的白居易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这一层关系的探究恰恰有助于我们窥见九世纪特定时空下的白居易，也有利于了解九世纪政治体制转型中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意识错位。这是一种新的“以诗证史”的努力，和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的方法和目的有较大差别，考察的既是白居易的“心史”，也是历史转变时期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客体角色之间的关系。陆扬的讨论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白居易对于进入到作为唐代政治核心的翰林学士院的反应；二是从中如何观察以翰林学士院为核心的新文学官僚体制在九世纪的转型。

诗文不是单纯的自我标榜，而是格格不入感的折射

唐代重要文人大多有仕途经历，可以通过文学书写来考察其仕途轨迹，白居易尤其如此。白居易在他晚年成为广受唐代社会乃至东亚世界尊敬的耆宿文臣，作品广被仿效，这种地位其实和他生涯前期拥有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等词臣带来的光环有关。然而以往的白居易研究，很少把他放在这种制度史的框架下考察，即使分析白居易在翰林学士任职期间写作，也常常想当然地从一些错误的前提出发。比如作为

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提交给唐宪宗不少意见措辞相当激烈的谏议，以往研究者往往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探究，就因为白居易曾担任过左拾遗这样的谏官，未能意识到这只是他任职翰林学士时的一个作为阶官的职衔。又比如在讨论九世纪初翰林学士的重要性的时候，往往拿白居易的撰作作为依据，却没注意到白居易对他的这种身份的清贵似乎缺乏认同，他在担任学士期间的诸多诗文并没有体现出那种身处权力核心、仕途清贵无比的荣耀感。恰恰相反，在他笔下不断出现的是一种疏离感和孤独感，和他在那一时期积极参与议政，提供大量谏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这种疏离感和孤独感究竟是一种自我塑造还是对这种身份地位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缺乏认同，正是陆扬的报告着重分析的。以上这些方面都涉及如何解读白居易的这些诗作作品的问题。陆扬认为，白居易的诗作固然有对古代隐逸诗人如陶渊明等的强烈模仿意识，他在翰林学士院撰写的那些诗文却不单纯是一种自我标榜，而的确是一种格格不入感的折射。比如他在《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中写道：“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在《松斋自题》中说：“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赠吴丹》：“顾我愚且昧，劳生殊

为休。一入金门直，星霜三四周。主恩信难报，近地徒久留。终当乞闲官，退与夫子游”。这些反复出现的意念具有高度一致性。要判断这些诗作的意涵，我们既要把它们放在中晚唐对翰林学士身份和工作的诗作群体中加以考察，也要对白居易进入学士院时的个人背景和身份，以及那段历史时期翰林学士院本身与权力核心的关系变化等方面加以考察。对于前者，陆扬特别举出与白居易有类似背景和生涯的莫逆之交元稹作为一个例子，认为白居易的诗作和生涯的关系也需要将元稹的诗作和生涯的关系作为参照体。元稹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撰作的《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就表达了与当年作为学士院学士的白居易截然不同的自我陶醉的荣耀感。

陆扬指出，九世纪初的翰林学士院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官僚机构，而是体现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理念的核心权力机构。白居易对于这一权力核心的疏离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且他在学士院期间对自己的生涯规划也体现出他对如何利用这一机缘迈向仕途巅峰的轨迹缺乏敏感，比如他在翰林学士的职衔升迁中，选择了薪水较多的京兆府户曹参军而非更符合类似于“八骏”的一些朝官位子，这些现象只有放在从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初期翰林学士院的转型这一制度史框架中才能获得更充分、完整的理解。陆扬

表示，翰林学士在开元时期出现，到贞元、元和年间逐渐成为最高文官的储备。他结合具体史料分析了翰林学士院入院模式在这三个时间段中的特点：贞元以前，入院职官有高有低，缺乏规律，说明学士院的临时性特点强；从贞元前期开始，入院职官变得极有规律，明显以下层文官入院为多，升迁速度缓慢，这是配合唐德宗特殊的统治理念；从元和初年开始，翰林学士院有全新的调整，一个明显特点是入院官职相较于贞元期间越来越高，且升迁速度大大加快，出院前的最高职衔也从中书舍人提升到户部侍郎。元和的这一模式一直维持到唐末。白居易的入院正处于这两种模式交替的那一刻，他个人的出身和对官僚文化的认知显然造成他对这一趋势缺乏把握，使他始终像个身处局内的局外人。但随着时光转移，到了九世纪中期，这一词臣文化造成的辐射力却最终将白居易置于聚光灯下，使他成为时代膜拜的对象。这正是历史变化下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之间的错位。

讨论环节，刘后滨回应了关于元稹和白居易的区别。他指出，白居易的特点是通达和乐天，而元稹满足于自身权位且爱炫耀。此外，刘后滨还指出，文学声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清流文化”便可以作为一种解释路径。但是，白居易不属于这条路径，相较而言，钱辉、沈既

济等人更加符合。

唐雯指出，翰林学士院从入院职官无规律到有规律的变化，与德宗的个人政治因素有关。制度史的背后是政治史，制度的变化与当时的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孙正军首先将南朝的情况与唐代进行比较。相较唐代翰林学士院中的官职，南朝出现知制造这一官职，任此官者可能会升迁，但不会有上限或者瓶颈。此外，关于白居易的诗作，他表示，历史研究以文艺作品为史料时，准确把握其所表达的含义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更重要的是呈现“猜谜”的过程，他认为陆扬关于白居易的个案研究正体现出了这种过程。

随后，几位学者就白居易的仕途经历进行了讨论。刘后滨提出一个问题——白居易的前半段履历某种程度上符合“八骏”的路径，但为何没有官至宰相？唐雯认为，原因在于白居易在选择做户曹这一节点上出离了“八骏”路径。

最后，各位学者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就如何理解白居易《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一诗中“地贵身不觉”这一句，陆扬认为，白居易诗歌稳定性非常强，采用另一套诗歌语言来描述身份，表现出他始终有着格格不入的想法。关于大理评事这一官职在唐代中后期被高梁子弟争夺的原因，刘后滨认为，受到重视是因为隔品升迁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升迁台阶越来越密。